

构建全球化

马丁·沃尔夫

如构建得法，
全球化能够带来空前的和平与繁荣；如构建不当，将会招致危机与灾难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主题。它不仅是对经济的构建，也是对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构建。

很多人认为，无论其结局是凶是吉，全球化都是不可阻挡的力量。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化会持续下去，也不能假设它在各个方面都能尽如人意。但我们必须有这个共识：全球化的构建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如能妥善实现全球化的构建，本世纪将会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协作与繁荣的时代。如处理不当，整个世界就会彻底瓦解，重现1914—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面。

全球化是跨国经济活动的一体化。此外还伴有其他形式的一体化，尤其是

人口的流动及观念的传播。技术、机构和政策，这三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共同成就了全球化。

纵观历史，技术和知识的创新是全球化背后的驱动力。它降低了运输及通信的成本，增加了远距离盈利型经济交流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些机会将会得到充分的利用。

甚至早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驾帆船航海的能力促进了全球帝国、远洋运动及全球贸易扩张的诞生。但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不断创造新的机遇。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推进全球化的动力是蒸汽机车、轮船和电报。当今时代，全球化的推动力是集装箱船、喷气式飞机、互联网和移动电话。

通信技术与计算机应用的结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变革。到2014年，全球每100位居民中有96位为移动电话用户，40位为互联网用户。20年前，这两类用户的人数都不多。信息越来越朝向数字化发展，世界各地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

机构同样很重要。回顾历史，帝国推动了远距离贸易的发展。进入现代之前，情况确实如此，尤其是16—20世纪的欧洲海上帝国。当今时代，推动远距离商业往来的机构是协商和多边组织：WTO、IMF和欧盟等区域组织。

半公开和纯私有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特许贸易公司，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19世纪起出现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有组织的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机构，特别是金融市场，已经从初期的简单服务发展到如今提供24小时服务的全球化网络。

技术之矢已经转移方向——朝着经济一体化的机会前进——但我们的机构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帝国的繁华已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举办的普什卡骆驼节上使用手机通话的人。

经落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帝国不复存在，大部分新独立的国家以其具有剥削性为由拒绝了国际商业交流。

这就需要第三个推动力——政策。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政策上自给自足的倾向是一种倒退。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倒退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后全世界范围的全球化的瓦解。金融秩序随即分崩离析，贸易活动受到的限制越发严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有限的自由化在高收入经济体蔓延，主要表现在贸易和经常账户方面。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和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国内市场自由化、国际贸易的开放和外汇管制的放宽。

这个历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包括：70年代末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1980年罗纳德·里根出任美国总统；1985年欧盟发布“单一市场”计划；1986年开始，历经八年才结束的多边贸易谈判的乌拉圭回合；1989—1991年苏联解体；印度在1991年外汇危机后开放国门；1992年成立欧洲货币联盟；1995年WTO的成立；2001年中国加入WTO。

拥抱市场

在这些变革的背后，是对中央计划经济和自给自足政策的拒绝，是对市场、竞争和开放的接受。这不是全球帝国，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连结了众多以经济繁荣为共同目标的独立国家的活动。

虽然尚不完善，但它发挥了作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4年）的数据表示，就在大衰退到来之前，商品、服务和资金的流动占全球总产出的比率从1980年的24%增长到2007年的峰值——52%。1995—2012年间，商品贸易占世界产出的比率从16%上涨到24%。

实际上，所有经济体都放宽了对贸易的限制。金融危机期间经济骤降之前，中国商品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增长到1996年的33%，到2006年已增长到63%。印度贸易额与GDP的比率从1996年的18%增长到2008年的40%（见图1）。

贸易扩张的重要驱动力是新兴经济体中低成本劳动力的可利用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大的机遇是将未开发的地区（尤指美洲）纳入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当中。而这一次，最大的机遇是将从前相距遥远的亿万劳动者联结起来，然后是消费者和储户。

新兴经济体参与的贸易活动迅猛发展。1990年，60%的商品贸易发生在高收入经济体之间，另外34%

商品贸易集中在高收入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活动只占6%。2012年，以上比值分别调整为31%、45%和24%。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核心参与者。这一点单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增长即可显示出来，FDI带来了企业跨境所有权。1980年，FDI很少，可以忽略不计。如今，FDI不仅是巨额资本流通（2005—2012年，平均占全球产出的3.2%），还是稳定的资本流通。事实证明，它起到了三重作用——它是知识转移的来源、推动跨境经济一体化的媒介以及稳定的融资形式。

人们与本国同胞间的贸易交流比与外商合作更多。

金融领域的其他方面远远谈不上稳定。2007年，跨境资金流动占全球产出的21%，达到最高点，2008年降至4%，2009年至3%。随后，接连出现适度的经济复苏。但直到2012年，跨境贷款、债券保险和有价证券流动仍未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跨境贷款的主要来源是银行，非常不稳定，危机中通常都会如此（见图2）。

在贸易、金融和通信迅速发展的同时，人口的流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尽管如此，国际旅行者、留学生的数量明显增加，移民的实际增长速度也几乎与全球人口的增速同步——但实际收入方面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贸易和资本的流动代替了人口的流动。从贫困国家向较富裕国家移民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压力，尤其在格兰德河和地中海沿岸地区。

另外，全球化意味着跨境经济活动的不断增多。但提到经济的繁荣，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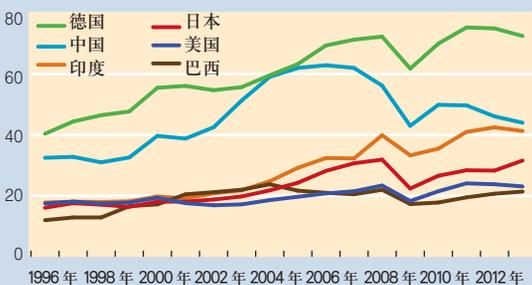
全球化时代推动了经济活动区域的快速转变。按购买力平价（简称PPP，在各国购买同样数量的商品

图1

开放

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前，世界大型经济体的贸易开放程度日益上升。

（商品贸易，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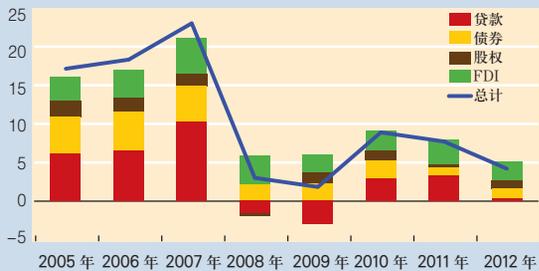
注：商品贸易包含一个国家所有的出口和进口。

图2

变化无常的金融业

除外国直接投资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几年中，跨境金融高度不稳定。

(资金流动，占全球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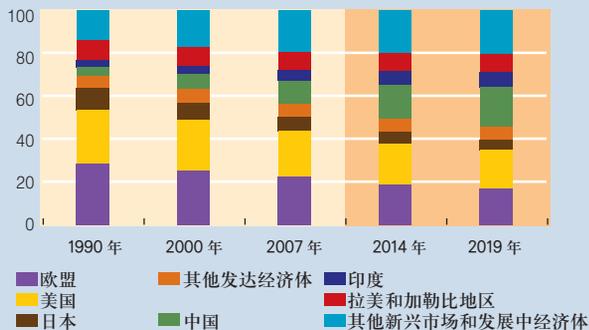
注：FDI是指外国直接投资，包含企业的外资所有权。

图3

力量转移

包括美国与欧盟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占世界GDP的份额在不断缩小，而中国和印度的份额则在不断增大。

(占全球GDP的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4年4月。

注：2014年和2019年数据为预测值。GDP的测量依据是购买力平价——在各国购买同样数量的商品和服务时需转换的货币的汇率。

和服务时需转换的货币的汇率)衡量，1990年高收入经济体的份额占全球产出的70%，其中欧盟占28%，美国占25%。根据IMF的预测，2019年高收入经济体的总份额将下降至46%。

同一时期，预计中国所占份额将从4%增长到18%，印度所占份额将从3%增长到7%。如果不参与贸易，不采用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大部分取得成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就不可能实现快速发展，进而引发这场变革（见图3）。

此外，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趋同状况（见图4）。与美国相比，预计中国的人均GDP将从1980年的2%增长到2019年的24%。无论以哪种标准衡量，这都是非凡的成绩。按购买力平价预测，2019年中国人均GDP高于巴西，中国将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印度也同样表现出这种趋同性，但范围较小。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也有不俗的表现。但预计到2019年，相较于美国，巴西和墨西哥比1980年时更加贫困。事实证明，

要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并非易事。

普遍贫困有所下降

全球化的时代实现了普遍贫困的显著下降，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每日生活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口比率已有所下降，从1981年的77%下降到2008年的14%（World Bank, 2014年）。南亚地区极端贫困人口比率从1981年的61%下降到2008年的36%。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981年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51%，到2008年，此比率仍高达49%。

最终，全球化还涉及不同国家间及国家内部收入分配方面的复杂变化。世界银行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 2012年）认为，全球个体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全球化时代大体保持不变，相对于富裕国家，一些大型新兴经济体为提高其平均收入而取得的成就被大部分经济体中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所抵消。他还表示，1988—2008年全球收入分配排名前5%的经济体享有最大的实际收入增长，前1%的经济体享有巨额收入增长。来自底层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排在第10个至第70个百分位数的经济体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然而，有两个群体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差——底层的10%，这是世界上最贫困的群体，以及来自底层的第70个至第95个百分数位，他们是高收入国家中的中低收入群体。因此，全球范围内实际收入的有益增长与许多高收入国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相关联。原因很复杂，但全球化无疑是原因之一。

未来的前景如何？

技术将会继续推动一体化的发展。很快，几乎每个成年人，还有许多孩子都很有可能会拥有一部智能移动设备，以便他们及时地查看全球网络所提供的所有信息。这将使所有可数字化的事物——信息、金融、娱乐和许多其他事物的传递基本上实现零成本。这必然导致信息交换的激增。

虽然技术领域中的一部分正在飞速的发展，但其他方面（如商品和人员的运输成本）并未显著降低。这说明与商品或人相比，技术进步将会为理念和信息的交流带来更多的机会。

机构和政策的明天更加难以预料。

最明显的机构和政策失败也许一直存在于自由化、全球化的金融管理之中。具体如下：1970年至2011年间共发生147次银行业危机（Laeven和Valencia, 2012年）。其中，部分具有全球性影响，尤其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以及随后出现的欧元区危机。这些冲击造成了巨额经济和财政损失。尽管我们已为建设更稳固的金融体系、更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制度做出努力，但并不

不能保证会取得成功。

浮动汇率

货币制度与金融秩序的混乱密切相关。自1971年以来，全球货币制度一直采用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度，由美元占据主导地位。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但同时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有许多人控诉这种制度放任美国利用政策给流向或来自不幸的局外人的资本造成不可预测且无法控制的变化。然而，不受欢迎的浮动美元标准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因为目前没有和其他货币和全球性的管理方法有望指导我们所需要的一致性，至少近期没有。

目前在高收入经济体中，贸易政策已经相对稳固，重新陷入保护主义的风险已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然而，为完成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所做出的努力基本上已经失败，雄心勃勃（且颇有争议）的多边贸易协定计划前途未卜。贸易自由化的高潮或已退去，而世界商品贸易的增长也可能会永久性地放缓。

一些国家政府正在设法控制互联网的发展。但这一努力可能不会阻止商业活动的传播，尽管它可能会限制公民接触令人不安的政治观点的途径。同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未来若干年中很可能只增不减。

在经济体之间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同时，政府也在持续地提供保障、实施法律、监管商业、管理货币。商业自由交流的地方，受到影响的管辖区不只一个，当然有关各方必须遵守交易所在地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经济和政治维度间的反差是不可预见性的根源。贸易交流越多，就有更多的国家必须同意机构和政策上的深度合作，欧盟的表现非常明显。这种一体化也会带来矛盾，欧元区危机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同等程度的一体化对如今的许

多国家来说仍然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这些原因，全球化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人们与本国同胞间的贸易交流比与外商合作更多。空间距离是部分原因。同时还存在相互信任和透明度的问题。边境问题很重要，并且在未来仍会如此。

最终，政府必须同意这种开放。在开放的同时，他们会考虑国内的政治现状。在一个众多国家面临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的世界里，尤其是在高收入国家，无法确定这种同意意见能否持续下去。人类的种族意识始终存在，国与国之间仍然是竞争对手。

1910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化的顶峰时期，英国政治家和记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撰写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战争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他是对的。理智上，几乎所有国家的首脑都同意这一点：冲突无法促进国家的繁荣。但是，1914年的战争证实，战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并不能保证人类会从此避免战争，尽管核武器已将冲突的代价提升到了不可想象的高度。

虽然大国间仍维持着和平的关系，但要实现深度一体化的、繁荣的世界经济所需要的国家间的合作可能无法维持下去。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设法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和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崛起。从历史经验看，在短期到中期内，无论技术还是经济学都无法保证全球化的未来；只有政治决策可以。明智地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

参考文献：

Laeven, Luc, and Fabián Valencia, 2012, "Systemic Crises Database: An Update," IMF Working Paper 12/16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4, Global Flows in a Digital age: How Trade, Finance, People, and Data Connect the World Economy (Seoul, San Francisco, London, Washington).

Milanovic, Branko, 2012,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by the Numbers: In History and Now—An Overview"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259 (Washington). <http://elibrary.worldbank.org/doi/pdf/10.1596/1813-9450-6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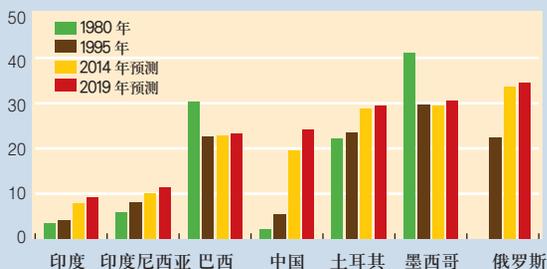
World Bank, 201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http://data.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wdi-2014-book.pdf>

图4

不断趋同的生活水平

自1980年起，相对于美国的情况而言，一些（远远不是全部）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已提高了其人均GDP。

（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4年4月。

注：GDP的测量依据是购买力平价——在各国购买同样数量的商品和服务时需转换的货币的汇率。国家的顺序根据2019年人均GDP预测值从低（印度）到高（俄罗斯）排列。